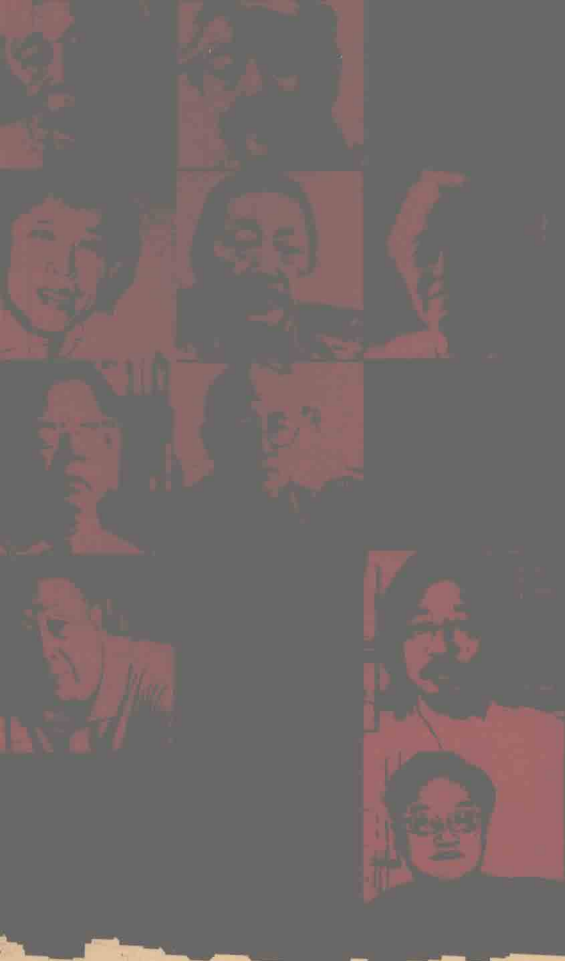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真正独立，30年后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阔别起死回生事件可以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裕、追赶时代步伐、国际舞台、迈向工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的里程碑。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历史为何存在？依托政治强人，这场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改革，在中国危难时越发显现出救世主地位。但正是以这种方式，30年来，中国在同力于国家建设，没有30年，改革开放，中国公民社会成长，民心何堪堪？30年改革开放，中国为本，国家何堪？30年，又何能言？30年，又何能言？

改革开放时代更年并进而提炼30年之精髓，切年之脉动。一眺望尚在中的这一伟大变革前景，圣道在，照耀来者，却在以主流大报社会公器为各方都市报，本身即生产物，面对中国的风云际会，社会激荡，国崛起，总是心怀责任，不甘呐喊助威，就像这革发物于报章的一篇天，经验直理的唯一，有时传好就

改革家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 编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



五，59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中国真正独立，30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国崛起。上述事件可以有力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强，追赶时代步伐，国际社会，迈向工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几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何在？依托政治强人，这场波澜壮阔、深刻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危难时越发显现。川8级大地震，以灾难的方式为30年做了序。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力上何以应对！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民社会何以成长，民心何其用！没有30年改革开放，中国何以以人为本，国旗何以不降下半旗，又何能为世界哀三日！没有30年的改

南方

改革开放断代史并非面面提炼30年之精髓，30年之脉动，眺望尚中的这一伟大变革前鉴过往，照耀来者，事。

以主流大报社会公器的南方都市报，本身是时代产物。面对时代的风云际会，社会激国崛起，总是心怀责任，不住呐喊助威，就像改革发轫于报章的一篇，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时传媒史的代。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南方都市报 编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 / 南方都市报编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406-7196-9

I. 变… II. 南… III. 文化史-中国-现代 IV. 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398 号

责任编辑: 邹靖华 杨 洁

责任技编: 肖作勤

封面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250 000 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7196-9

定价: 2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34120440

南方都市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丛书”编委会

主 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江艺平

副 主 任：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 庄慎之

总 策 划：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任天阳

总编辑助理 王 钧

总编辑助理 苟 骅

《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主创人员

总 策 划：崔向红

内容统筹：王来雨 侯虹斌

出版统筹：张 超 黄兆晖

撰 稿：田志凌 黄长怡 钟 刚

摄 影：田志凌 黄长怡 钟 刚

文字编辑：侯虹斌

总序

镜鉴过往，启迪未来

任天阳（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或可以称之为“邓小平改革”，是近代以降中国最伟大、成功的改革。110年前的戊戌变法让中国以法律形式开始追赶西方，97年前的辛亥革命让中国开始走向共和，89年前的五四运动让中国开启科学民主，59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中国真正独立，30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国崛起。上述事件可以列为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独立富强，追赶时代步伐，融入国际社会，迈向工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几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何在？依托政治强人启动的这场波澜壮阔、深刻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历史价值在中国危难时越发显现。汶川8级特大地震，以灾难的方式为30年做了注解。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力上何以应对！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民社会何以成长，民心何其用！没有30年改革开放，中国何以以人为本，国旗何以普通人降下半旗，又何能为普通人国哀三日！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国将不国，人亦非人。

什么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最好方式是深刻提炼30年的历史精髓，确立下一个30年、50年、100年中国前行的坐标。

依盛世修史，必穷其史料，旁征博引，写一部30年改革开放断代史并非难事。而提炼30年之精髓，切中30年之脉动，眺望尚在行进中的这一伟大变革前景，镜鉴过往，照耀来者，却非易事。

以主流大报社会公器为追求的南方都市报，本身即为改革开放产物。面对中国30年的风云际会，社会激荡，大国崛起，总是心怀责任，禁不住呐喊助威，就像这场改革发轫于报章的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样，有时传媒就是历史的代言人。



新闻记者是时代的瞭望者，新闻记者同样是时代的回眸者。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即今天的历史。秉笔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是传媒的责任。南方都市报斥巨资推出的纪念30年改革开放系列报道，以民间姿态梳理历史，踏访故地，求证实物，复原真相，让亲历者口述30年珍记，让研究者评说30年得失。试图从新闻视角回眸30年，以新鲜史实昭示启迪改革前景，以亲历口述提炼30年改革开放精髓。是回望，更是憧憬。有叙事，更有评说。不求通史，只求价值；不仅是史实，还有史识。既然是改革，就有失败；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有风险。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报道立足于忠于历史，不媚不讳，敬重诚直。报道既有30年改革成功者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再现，也有落寞者无奈黄昏的摹写。既有重大改革节点事件调查，也有重大改革命题启示宏论。从史事出发，为来者激励。不仅为成功者立传树碑，也为失败者续写尊敬。

依推出时间顺序，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报道包括人物、事件、政论、论坛四个组成部分。在体例上，纪传编年交叉。在选题上，政经文农工商并举。在地域上从广东出发，遍及全国。

既然不是修史，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报道，难免挂一漏万，考证粗浅。谨祈有限报道，为中国未来改革者壮行助威，为下一个30年前行提供点滴启示。

目录

总序 →→→1

《于无声处》：三十年前的第一声惊雷 →→→1

1978年，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部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短短两三个月内，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受其直接影响而得以平反。

《假如我是真的》：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话剧 →→→15

1979年，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的几个剧院内部演出。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剧坛上很少有一部戏敢于把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作为批判对象的，此剧被认为“揭露社会疮疤”，引发了一场争鸣和停演风波。

《萨特研究》：当时的中国需要这本书 →→→27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曾经掀起过一股萨特热，萨特为一代知识读者所知晓，并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深刻影响。1981年，柳鸣九撰写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研究》，标志着萨特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

“走向世界丛书”：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实际很快 →→→39

刚从文化禁锢和思想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之初，中国出版界与知识界四顾茫然，思想资源贫瘠，知识与学术园地荒芜。1980年，“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在改革开放前期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星星画展：“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 →→→51

1979年，北京一批艺术青年在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举办画展，命名“星星画展”，画展遭遇封杀而后复展，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星星”美术是对“文革”美术的彻底颠覆，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潮美术运动。

《读者》：他们有道德底线，那就是真善美 →→→63

1981年，《读者文摘》创刊，后易名《读者》。不管政治变迁，不管思潮流转，《读者》的办刊风格始终如一，那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润物无声地传输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二十余年畅销不衰，其对读者的影响不容低估。

《今天》：青春和压力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75

1978年，北岛、芒克等几个文学青年油印了一本民间文学杂志《今天》，其中刊载的文字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旋即在大学校园里受到狂热追捧。《今天》和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群”，成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

《伤痕》：它是众缘成就的，我只是记录者 →→→87

1978年，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由此开创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重要的小说门类“伤痕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泼水节》：那时，画人体也是改革开放的象征 →→→99

1979年，首都机场内一组壁画轰动了全国美术界，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遭封杀，因为画中出现了沐浴的裸女人体形象。近三十年后，这幅壁画的封杀墙像扔废品一样被搬走，没经任何人批准。

《崛起的诗群》：一篇诗歌评论引来几百万字的批判 →→→111

1983年，徐敬亚发表诗评《崛起的诗群》，宣告新诗潮“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如一枚炸弹在诗坛炸响，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崛起论抵挡住岁月的淘汰，进入21世纪，在时光之中焕发出诗学之美。

青春诗会：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 →→→123

1980年夏天，第一届青春诗会在北京和北戴河举行，舒婷、顾城等17位青年诗人出席，诗会的成果载于《诗刊》“青春诗会专号”，轰动诗坛，为推动新时期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青春诗会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

《陈寅恪文集》：他的文集出版，可以活跃学术空气 →→→135

1978—1980年，《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出版的首部个人学术集，对当时学术出版界的恢复、重建，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在它之后，多部个人学术集相继出版，学术出版界逐渐回暖。

《小灵通漫游未来》：它是未来世界的“清明上河图” →→→147

1978年，《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首印300万册。在科技知识一片荒芜的改革开放初期，这本充满童稚的科幻小说为当时的中国儿童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直到现在，仍有无数的人对这本深刻影响他们童年的小书念念不忘。

《诗刊》：青年诗人在这里后来居上 →→→159

1979年，《诗刊》转载北岛和舒婷的诗，把地下诗歌潜流引到地上来，打破了传统文艺那种“假大空”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一批年轻诗人在《诗刊》扶持下迅速涌现，随后还引发了关于“朦胧诗”的大争论。

《这一代》：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 →→→169

1979年，全国13所高校的77级、78级大学生联合办了一本文学刊物《这一代》。这本自编自印自销的刊物只办了一期，而且只有半本，因为受到某高层批评，创刊号也就成了最后一期。但它在当时的大学生中的影响却是广泛的。

无名画会画展：这是与政治无关的纯绘画展览 →→→18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验艺术在中国一直被主流艺术所掩盖，但它作为社会潜流却未曾中断过，无名画会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坚持艺术试验。因此，1979年，当无名画会的作品在北京北海画舫斋展出时，整个中国画坛都为之震动。



《于无声处》： 三十年前的第一声惊雷

1978年，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部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短短两三个月内，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受其直接影响而得以平反。



[宗福先访谈]

宗福先在他的家里接待了记者，礼貌而淡定。“你是我今年接待的第九位记者。”他说。所有记者感兴趣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关于他的话剧处女作《于无声处》。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部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宗福先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清晰到具体某一天。

三十年前，还是上海热处理厂工人的宗福先，业余创作了这部只有六个角色的话剧。这部话剧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背景，讲一个家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表达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支持，并喊出“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短短两三个月内，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受其直接影响而得以平反。

《于无声处》改变了宗福先的一生。他从一个工人成为著名剧作家，生活境遇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三十年来他创作了多部话剧、电视剧、电影剧本，现在是上海作协专职作家。这部作品甚至影响了宗福先的人生观。

面对这么多记者的访问，宗福先的心情有些复杂：“一部《于无声处》吃了一辈子，真是很惭愧。”但有位朋友的话让他很认同：“如果‘四五’天安门事件一直不能平反，至今还是个反革命事件，那么这出戏带来的后果，你也得承担一辈子。”

我糊里糊涂开始学写戏

记者：《于无声处》是一出特别的话剧，很多即使没有看过的人，也知道它。



宗福先：因为它超出了话剧的范围，后来它从话剧舞台走上了政治舞台。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老百姓的诉求总需要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即使没有《于无声处》，也会有其他的话剧、电影、小说或者另外的载体。《于无声处》主要是生逢其时，就在那个当头出来了。

记者：在创作《于无声处》之前，你不是专业的戏剧家？

宗福先：不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工厂当工人了，在热处理厂，那是1968年的事情。之前因为身体不好，哮喘发作，引起气胸，读完当时五年制中学的前三年就休学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按照66届初中生分配到热处理厂。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宗福先：1972年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病愈以后我就长期病假在家，休息了八个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政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阶级斗争是要搞，但是要讲政策。结果一提笔，就写了37万字。后来我就把这个小说送给茹志鹃老师看，茹老师就说，你完全不懂得怎样创作，37万字没有一个故事。但是你的语言比较好，也有自己的想法，凭这两条你就可以搞创作。这以后，在茹老师的引导下我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我那时25岁。

记者：从写小说开始，后来就开始写剧本了？

宗福先：那时候全上海没有学写作的地方，但工人文化宫有个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老师叫曲信先。我想到那里学习，但曲老师让我写个剧本当做入学考试。我说服他看看我的小说。过了两天，曲老师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里。他说，我收下你了，我看了你的小说，发现你的语言特别好，写戏主要靠语言，我要你了。我就这样进了文化宫，糊里糊涂就开始学写戏。这完全是很偶然的因素。那是1973年的事情。

记者：在训练班里学习到什么内容？

宗福先：曲老师讲课的最大好处就是实用，他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得非常好。另外当时他请了很多他的同学，比如余秋雨，以及后来的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都给我们上过课，这批人是我们的老师。

“如果你因这出戏被抓，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记者：我了解到，《于无声处》这出戏是你的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给你最直接的创作冲动。那时在上海人们都不知道“天安门事件”吗？

宗福先：知道北京有事，当时有人听“反革命”广播“美国之音”就知道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都有大标语，有“打倒张春桥”、“揪出反周总理的黑手”之类的口号。火车一律被拦在上海外面，把标语洗掉才能进来。至于具体的情况就谁都不知道了。有位朋友一来，就告诉我有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我当时一听，就觉得

有种归属感，找到自己的队伍了。

记者：你是说上海人虽然没有举行抗议活动，当时心里也有这个想法吗？

宗福先：那当然有。其实也不是从1976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把整个社会折腾成这副样子觉得不好。那种对整个社会混乱不满的情绪，绝对不是后来才有的。我有一个在美国的同学，2005年我到美国去访问，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他就跟我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是从宗福先那里来的。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可承担不起啊。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抄了一本马恩列的语录，那时候给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我想，对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不是这样讲的。我真的不是那么早就怀疑“文革”的，没那么大胆子，也没那么高的觉悟。我只是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受很大的变故，而是整个社会都弄成这样了，但是不敢说，不敢跟别人交流。

记者：所以一旦听到北京这样的消息，就很振奋？

宗福先：是的，那个朋友跟我说，有上百万的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要打倒张春桥、江青，一下子就觉得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其实大家也这么想。一下子就觉得力量壮大了，心里踏实了很多，所以我说有一种归属感，好像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兜头就是一盆凉水。那个夏天对于我来说是很苦闷的，那时候就反复吟诵鲁迅先生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还有一首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记者：几个月后“四人帮”被打倒了。

宗福先：是10月份的事情，那时我陪母亲在黄山，然后出山的时候看到大标语。回到上海看到大字报，我就留意到群众在看这些东西时的那种兴奋心情。我以前有过一个想法：中国人明明是忍无可忍了，脸上还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忍耐精神实在太好了！那天我就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然后就开始想要把这些写成一个话剧。

记者：但那是1976年，你真正写出来的时候是1978年，对吧？

宗福先：是1978年，那时有几个原因。一开始只是很朦胧的想法，到底怎么写根本没有想好，后来读到了很多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看了以后真的是热血沸腾。鲁迅一直在说中国人的国民性。我想象这些人在1976年那种情况下，敢于到天安门广场去大声怒吼反对“四人帮”，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骨，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歌颂他们是应该的！另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结构，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后来到了1978年突



《于无声处》首演剧照

然又是一场大病，我想到要写一个家庭，然后一点一点地把结构搭建起来。

记者：那你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没有政治方面的压力呢？

宗福先：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平反，但是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件事它早晚都会平反的。悼念周总理难道错了吗？反对“四人帮”错了吗？压力是有的，当时记得我已经开始在写了，突然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介绍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叫韩爱民，当时很有名的人。我就如获至宝把这份报纸保藏到现在。那时的确感觉我有了依据似的，这不是宣传了吗？另外一方面，演员张孝中当时跟我说，哥们，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这戏如果成了，你要请客。我说没问题，不过万一要是我因为这个戏被抓进去了，你们得管给我送饭。结果所有的演员说，没问题，我们大家轮流给你送饭。那就说明当时知道还是有风险的。

记者：你花了多少时间写完剧本？

宗福先：写得挺快的，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因为脑子里酝酿的时间很长很长，反反复复在想。而且这些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写起来的确比较顺。

为了买票，头天下午3点就有人通宵排队了

记者：当时演这出话剧的是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话剧队，当时排戏有困



难吗？

宗福先：排戏很困难的。因为都是工人演员，白天在上班，晚上赶到工人文化宫。几个演员的家和工作单位、工人文化宫的距离非常遥远，几乎是在上海最边缘的地方：吴淞、吴泾、闵行。但大家坚持排练，热情都非常高。没有为名为利。我们排戏是一分钱都没有的，但是每天如果你工作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就会有两毛七分钱的夜宵费。至于名嘛，没有任何名的，只是一场群众业余演出，谁知道后来弄成那样。就是对戏剧的热爱，对这个剧本的喜爱，很纯粹的。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演？

宗福先：9月份。5月份写的剧本，7月份开始排练，然后到9月份演出。9月22日第一次彩排，彩排那天主要是那些演员和文化宫职工的家属，所以来的人特别杂。那是我第一部正式演出的话剧，所以心里很忐忑。结果演了十分钟，台下就非常安静了。最后的演出效果是出乎意料的，观众持续不断地鼓掌。演完了演员都去卸妆了，导演苏乐慈就在那里拼命地叫：“谢幕！谢幕！”演员就匆匆忙忙地上，有的衣裳换了，有的还没有换。从那天开始，大家就觉得特别幸福。

记者：之后的正式演出卖票吗？

宗福先：一毛钱一张票。后来过了没几天就开始排队了。

记者：一场有多少人？

宗福先：400个人。后来就没票了。来看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包场的越来越多，一买就是80张、100张的，开始来的是个人，后来的就不是了。我们在上海大概在十几个剧场来回演，今天给《解放日报》通讯员演，明天给“劳动模范”演。

当时我们总工会的一个副主席张伟强，她很支持这个戏，后来带这个戏去北京。她说，我最发愁的事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电话一响，又是问我要票的。很多都是上海老干部，那时的票实在是太紧张了。后来到北京演出，原来计划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四场。那是第二天上午10点卖票的，结果头天下午3点就有人排队了。北京11月啊，多冷啊，到了半夜里门口人越挤越多。结果是凌晨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叫了起来，怕出事。最后他当场决定要加演，让大家不要急，一定会让大家买到票。

我们在上海演了四十几场。在北京也是四十场左右，后来到各处去演，有时候是一天演两场。

记者：这出戏的爆炸性效应很大啊。

宗福先：说句实话，这出戏再晚半个月出来都不行了。《文汇报》记者周玉明10月12日报道了这出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10月23日到上海调研，当时看了《文汇报》的报道，点名要看这出戏。

记者：胡乔木对这个戏评价很高啊。



总政话剧团演出《于无声处》剧照

宗福先：就是因为他看了戏，所以整个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在11月10日开幕，为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他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出戏调到北京来，对于推进“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胡耀邦就同意了，由他们来策划。

31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来了，看完戏，他上台接见大家时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都欢呼起来了。后来刘复之就留在上海安排上京演出，周巍峙在北京担任《于无声处》接待组组长，安排我们进京。

记者：场面很大啊。

宗福先：到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于无声处》。那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全国转播，全国不知有多少观众，包括部队。

记者：《文汇报》也登载了《于无声处》的剧本，是这个剧本第一次发表吗？

宗福先：10月28日，胡乔木看戏的那天，《文汇报》开始连续三天把剧本原文发表。这是《文汇报》的主编马达安排的。他当时也冒了风险，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破天荒地用三天的时间连



载了剧本。

记者：为什么这么敏感？

宗福先：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是没有平反啊。你一个小剧团演戏看的人是有限的，可是当时《文汇报》的发行量是一百多万。你向全中国这样一撒的话，万一有事责任就很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作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

这个戏一来，一切都改变了

记者：当时在北京是什么状况？

宗福先：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华国锋有个讲话，讨论农业问题等等。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个讲话，就完全突破了某些框框，提出中央决定要转移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有些“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要解决，第五个问题他就提到“天安门事件”，还提到《于无声处》。陈云讲话的第二天我们就动身去北京了。13日动身，14日到达，15日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6日，一是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胡乔木组织的那篇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

记者：北京人看到这出话剧的反应，和上海人有不同吗？

宗福先：北京人是当事人，政治热情高得多，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时胡启立是团中央的书记，团中央组织被平反的、被释放的三百多个参加“天安门事件”、反“四人帮”的英雄，为他们专场演出。

结果演出结束幕布还没有拉好，他们从台下就蹿上来了，整整挤了一台，抱着我们哭啊，笑啊。后来团中央举行表彰大会，他们每个英雄胸口都戴朵大红花，也要给我戴。我就不肯戴，我说不行，我从来就没有反过“四人帮”。他们就抓住我的手，不许我摘。“你怎么不反‘四人帮’啊？你用你的戏跟我们一起反了‘四人帮’，你跟我们就是一伙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北京的压力。”

记者：观众也给你们写信吗？

宗福先：很多，几千封信。天津有人给我写信，说她母亲就跟戏里的梅林一样。她被打成叛徒多少年，都要省下钱来交党费。还有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她说每个月几块钱的生活费她都要存起来交党费，那时候杨尚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李伯钊还给我写了个地址，说尚昆同志正在等待中央给他结论。你来我们家聊聊。我没敢去。

记者：为什么你不敢去？

宗福先：我是喜欢静的人，不喜欢动。再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又比如夏衍夏公，当时他招待日本人吃饭，邀请我去作陪，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他住在南竹竿胡同，他说你到我家里来，我再跟你聊。我也没